

契丹早期墓葬研究

毕德广

魏坚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大连 116081)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目次

- 一 考古发现与研究
- 二 陶器的类型学分析
- 三 墓葬分期与文化特征
- 四 契丹早期葬俗及其演变

契丹源于东胡族系,活动于辽西地区,至唐后期开始崛起,逐渐统一了周边少数民族,建立了辽国,重新形成了北方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南北对峙的局面。契丹族对古代中国乃至整个欧亚大陆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契丹文化因之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契丹文化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但主要集中在辽建国之后,对辽建国之前的考古学文化,尤其对契丹早期墓葬的研究比较薄弱。契丹早期墓葬大体是指分布在契丹活动范围内的辽建国以前的契丹人墓葬^{〔1〕}。这些墓葬与辽建国之后的契丹墓葬有所区别,更多地显示出契丹族的传统文化因素和游牧文化色彩,属于契丹墓葬制度的形成阶段。建辽后,契丹墓葬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但部分辽初契丹墓仍沿用早期墓葬的形制,随葬契丹人在建辽前习用的器物。为了更加清晰完整地探讨契丹早期墓葬的基本形制与文化特征,我们将这类墓葬也纳入契丹早期墓葬的研究中。

一 考古发现与研究

从考古发现来看,契丹早期墓葬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与辽宁中西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与黑龙江大庆等地发现的唐代墓葬中也出土有契丹或契丹风格的器物。这些墓葬也被认为与契丹族有关。

〔1〕 考古学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一般不会随着政治或文化的突发事件而发生遽变。辽早中期的部分契丹墓继承了辽建国前契丹墓的文化特征,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因此,所谓的契丹早期墓葬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内蒙古通辽地区发现了几座出土篁纹陶器的墓葬^{〔1〕}。乌斯吐墓位于通辽角干镇乌斯吐村北,墓葬为火葬墓,东南—西北向,墓坑风蚀严重,墓底残存骨灰、木炭等灰烬,骨灰之上覆盖几层桦树皮,出土物有大口夹砂陶罐、泥质陶罐、六瓣瓜棱陶壶、铁刀、铁匕、磨石等。乌日根塔拉墓位于扎鲁特旗鲁北镇乌日根塔拉村南,该墓为竖穴土坑墓,南北向,出土有盘口陶壶、陶瓶、铁刀等遗物。荷叶哈达墓位于扎鲁特旗鲁北镇荷叶哈达村东,该墓是一座石棺墓,石棺四壁用石板立砌而成,底部铺三块石板,尸骨葬,仰身直肢,头向北,石棺内发现羊骨和羊角,随葬品有大口夹砂陶罐、瓜棱陶壶、陶瓶、铁刀、铁矛等。库伦扣河子镇秦家沟西北一条黄土沟中发现大口夹砂罐和泥质陶壶各一件,根据发现地点周围遗迹状况,推测这两件器物出自一座墓葬。上述墓葬所出大口罐、盘口瓜棱壶、鼓腹罐、长颈壶等陶器,属于典型的契丹器物,器表上的篁纹是契丹器物的习见纹饰,而墓葬与出土物均具有较原始的特征。张柏忠对上述墓葬所出器物进行了类型学分析,探讨了各类器物的发展序列,并对墓葬族属和年代进行了探讨,结论是“这批墓葬是契丹人的墓葬,……荷叶哈达墓葬当在唐代前期,乌斯吐、秦家沟墓葬的时代当在唐代中、前期,乌日根塔拉墓当在唐代晚期”^{〔2〕}。张柏忠较全面地探讨了当时已知的契丹族早期墓葬,尤其对契丹典型器物的类型学分析,奠定了早期契丹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础。乔梁认为张柏忠对上述契丹早期墓葬的断代存在偏早的倾向,他认为乌斯吐墓和乌日根塔拉墓的年代在建辽前夕,荷叶哈达墓的年代略早,但不会早到唐前期^{〔3〕}。

呼斯淖墓位于内蒙古科左后旗甘旗卡镇东 40 公里。该墓为土坑竖穴墓,无葬具,仰身直肢葬,头向北,尸骨左侧有一具羊骨。出土器物有陶盘口壶、鸡冠壶、扁壶、瓜棱壶、盖罐,铁剑、铁镞,马具等。张柏忠认为墓中所出黄釉盘口壶上的锯齿形堆纹与李静训墓所出青瓷小罐的装饰风格相同,壶的釉色和壶颈部的凸弦纹都有唐代装饰风格。鸡冠壶的形态与唐开元、天宝年间的瓷仿皮囊壶相似,扁壶、盖罐和瓜棱壶均具有唐代及其以前的装饰风格。墓中出土的铜镜、铁釜、铁剑的形制或纹饰也具有隋唐时代风格,因此他将呼斯淖墓的年代定为唐末^{〔4〕}。乔梁亦认为该墓年代也在建辽前^{〔5〕}。

塔布敖包 M1、M2 位于内蒙古巴林右旗巴尔台苏木西南,均为竖穴土坑石棺墓。M1 石棺两侧壁用石板平砌而成,前端竖置一石板,后端开放,底部平铺一层石板。尸骨葬于石棺内,仰身直肢,头向北。随葬器物有陶小口长颈罐、盘口壶、大口罐、碗,骨簪、骨管,铁斧、铁刀,玛瑙饰件、料石、料珠等,另有羊头骨、羊肢骨、羊矩骨等。M2 石棺侧壁用石板砌成,前后

〔1〕 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哲里木盟发现的几座契丹墓》,《考古》1984 年第 2 期。

〔2〕 张柏忠:《契丹早期文化探索》,《考古》1984 年第 2 期。

〔3〕 乔梁:《契丹陶器的编年》,《北方文物》2007 年第 1 期。

〔4〕 张柏忠:《科左后旗呼斯淖契丹墓》,《文物》1983 年第 9 期。

〔5〕 乔梁:《契丹陶器的编年》,《北方文物》2007 年第 1 期。

端开放,底部铺石板,石棺内葬尸骨一具,侧身屈肢,头向北,出土高领小罐一件^{〔1〕}(图一,1)。M2 所出高领小罐为侈口,束颈,溜肩,鼓腹,平底,底部压印钱纹,形制及纹饰均与和林格尔县土城子晚唐 M5 所出印纹陶罐^{〔2〕}相近。M1 所出盘口壶、小口高领壶的形制分别与和林格尔土城子晚唐 M2、M11 所出盘口陶瓶、印纹长颈罐相似。故塔布敖包墓年代应为唐晚期至辽建国前后。

巴彦琥绍墓位于内蒙古巴林右旗巴彦尔灯苏木,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尸骨葬,仰身直肢,头向西北。出土有陶壶、铁剪刀、铁刀、铁镞、铁铃、玛瑙串珠等遗物(图一,2)^{〔3〕}。所出Ⅱ式壶的形态及纹饰与1986年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墓群出土的Ⅱ式壶^{〔4〕}和科右中旗代钦塔拉M3 所出长颈壶^{〔5〕}相近,从三者最大腹径与底部内凹程度看,巴彦琥绍墓陶壶年代介于两者之间。乔梁认为该墓年代应在辽建国前^{〔6〕}。

三道壕墓位于辽宁辽阳北郊太子河西岸的冲积平原上。土坑竖穴墓,葬具为木棺,尸骨仰身直肢葬,头向西北^{〔7〕}(图一,3)。出土有陶大口罐、陶瓜棱壶、铁刀、铜耳饰、铜指环、石珠等器物,其中大口罐、瓜棱壶为契丹墓习见随葬品。发掘者将其年代定为辽早期。张柏忠认为该墓年代要早到北齐至隋文帝时代^{〔8〕}。从出土物来看,大口罐的形制与乌斯吐墓的大口罐相近,口沿部均有四周凸弦纹,颈、肩部施多道篦纹。瓜棱壶的盘口较深,与乌日根塔拉墓、荷叶哈达墓所出者相同。故三道壕墓的年代应为唐晚期,距辽建立不远。

沙家窑墓位于黑龙江大庆西南约80公里。土坑竖穴墓,男女合葬,仰身直肢,头向西北,无葬具。出土陶壶、大口罐,铁削刀,铜铃,玛瑙,绿松石珠饰等^{〔9〕}。大口罐的形制与乌斯吐墓、三道壕墓所出同类器相同。陶壶的形制与西乌珠尔墓群采集到的一件陶壶相近。该墓年代为唐中晚期。

新丰砖厂墓位于黑龙江龙江鲁河乡。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单人仰身直肢葬,无葬具^{〔10〕}。墓中所出Ⅱ式陶壶,形制与巴彦琥绍墓Ⅰ式壶相同,器底钱纹押记与西乌珠尔墓群86M1 所出陶壶腹部钱纹以及大庆沙家窑所出陶壶底部钱纹相似。墓中所出陶瓜棱壶的盘口较深,形制与乌日根塔拉墓、三道壕墓所出同类器相近。该墓的年代应为建辽前。

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街北山坡遗址发现大量凸弦纹与印纹陶片,以及少量瓷片、铁器、动

〔1〕 齐晓光:《巴林右旗塔布敖包石砌墓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2〕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墓发掘简介》,《文物》1961年第9期。

〔3〕 苗润华:《巴林右旗巴彦琥绍辽墓和元代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

〔4〕 白劲松:《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古墓清理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2期。

〔5〕 兴安盟文物工作站:《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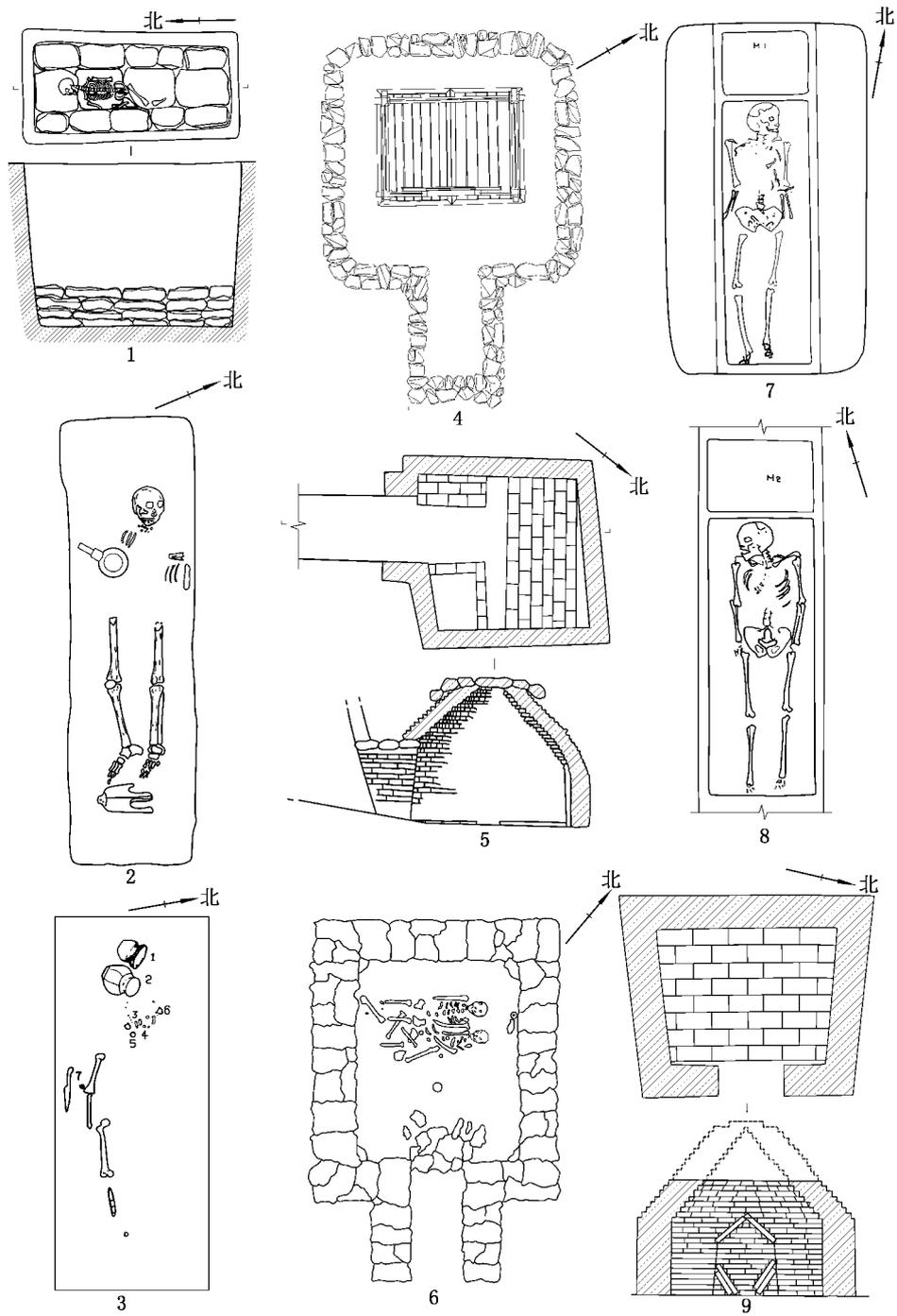
〔6〕 乔梁:《契丹陶器的编年》,《北方文物》2007年第1期。

〔7〕 李庆发:《辽阳三道壕辽墓》,《辽宁文物》1981年第1期。

〔8〕 张柏忠:《契丹早期文化探索》,《考古》1984年第2期。

〔9〕 云瑶、日平:《黑龙江省大庆市沙家窑发现的辽代墓葬》,《北方文物》1991年第2期。

〔10〕 邹向前:《黑龙江省龙江县鲁河新丰砖厂辽墓》,《北方文物》1995年第2期。



图一 契丹早期墓葬

1. 塔布敖包 M2 2. 巴彦琥绍墓 3. 三道壕墓 4. 哈喇海沟墓 5. 大横沟墓 6. 乌珠日山墓
7. 马莲屯 M1 8. 马莲屯 M2 9. 海洲乡 M3

物骨骼等遗物。陶器经过复原有大口罐、尊、长颈壶和鼓腹罐等。大口罐的口沿部有三周凸弦纹，口沿下和肩部分饰三周与一周水波纹，形制与荷叶哈达墓、塔布敖包墓所出者相同。长颈壶的造型与阜新海力板墓^{〔1〕}、敖汉旗沙子沟 M1^{〔2〕}等辽代墓葬所出同类器相近，唯腹部饰瓜棱纹。汪宇平通过对遗址出土物之间共存关系的考察，将这类以印纹陶为特征的遗存的年代定为契丹时期至辽代^{〔3〕}。北山坡遗址作为一处契丹族遗址，所出大口罐、长颈壶等典型器物，可与上述契丹早期墓葬所出同类器相互印证，对于识别契丹早期墓葬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上述墓葬是学术界认定的辽建国前的契丹墓葬，可简单概括出它的几个主要特征。首先，契丹早期墓葬一般为土坑竖穴墓，墓向一般为西北向或正北向。其次，葬制分尸骨葬和火葬两种。尸骨葬多为仰身直肢葬，个别为侧身屈肢葬，头向西北或正北。葬具为木棺或石棺等，石棺均为石板垒砌而成。最后，随葬品的种类、形制及其基本组合大致相同，多数以一般在口沿饰凸弦纹、颈部及上腹部施篦点纹的夹砂大口罐和在腹部施篦点纹的泥质瓜棱壶或长颈壶为基本组合^{〔4〕}。随葬器物除契丹族习用的大口罐、瓜棱壶、长颈壶外，还流行随葬铁刀、铁斧、铁镞等生产工具或兵器，玛瑙串珠、绿松石珠饰、料珠、石珠、铜耳饰等装饰品，以及马镫、马衔等马具。陶器一般放在头部周围，生产工具或兵器置于身体右侧，羊骨摆在身体左侧。火葬习俗与大口罐、瓜棱壶、长颈壶等随葬品属于契丹传统文化因素。随葬铁制工具或兵器、装饰品以及马具，尤其是殉葬羊骨，以及乌斯吐墓在骨灰之上覆盖几层桦树皮的做法，则显示出鲜明的游牧文化特征。总体来看，契丹早期墓葬的墓制、葬式和随葬品都很简单，随葬品组合比较单纯，具有浓郁的游牧文化色彩。

依据上文归纳的契丹早期墓葬的基本特征，还可以将以下墓葬推定为契丹早期墓葬。

虎吐路墓 位于内蒙古巴林右旗沙巴尔台苏木虎吐路嘎查。墓葬已遭破坏。据周围发现的火烧人骨推测，原为竖穴土坑火葬墓^{〔5〕}。所出陶大口罐和长颈罐的形制均与秦家沟墓葬所出同类器接近，推测该墓也属于契丹早期墓葬。

双井沟火葬墓 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双井沟村北。地表有石块垒砌的方形茱垣，茱垣中央有石块铺砌的方形石堆，石堆下为竖穴墓坑，坑内堆放骨灰罐。骨灰罐多在器壁施篦点纹，并凿有若干小孔。发掘者将该墓地定为契丹遗存^{〔6〕}。杨晶进一步认为骨灰罐上凿孔是契丹原始葬俗的遗留，年代为辽代早期^{〔7〕}。双井沟火葬墓的年代应在辽建国前。

〔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阜新海力板辽墓》，《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1期。

〔2〕 敖汉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敖汉旗沙子沟、大横沟辽墓》，《考古》1987年第10期。

〔3〕 汪宇平：《内蒙昭乌达盟印纹陶的时代问题》，《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4〕 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哲里木盟发现的几座契丹墓》，《考古》1984年第2期。

〔5〕 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虎吐路辽墓》，《北方文物》1988年第3期。

〔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昭盟巴林左旗双井沟辽火葬墓》，《考古》1963年第10期。

〔7〕 杨晶：《辽墓初探》，《北方文物》1985年第4期。

哈喇海沟墓 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大夫营子乡马连川村哈喇海沟(图一,4)^[1]。所出陶大口罐,颈部所饰水波纹与大庆沙家窑墓所出大口罐^[2]相似,但形制更接近荷叶哈达墓所出大口罐。沙家窑墓的年代为唐中晚期,荷叶哈达墓不晚于辽建立,则哈喇海沟墓的年代亦为建辽前。

大横沟墓 位于内蒙古敖汉旗新地乡大横沟村东。砖石混筑单室墓,平面呈方形,券顶。尸骨直肢葬,头东脚西(图一,5)^[3]。墓中所出瓜棱壶的形态及纹饰与呼斯淖墓所出几乎完全相同;陶大口罐的形制接近西乌珠尔墓群所出同类器。乔梁认为大横沟墓与阜新南皂力营子 M1^[4] 年代基本相当或略早,而后者年代与耶律羽之墓^[5](942 年)相当或略早,则大横沟墓的年代应在建辽前后^[6]。

乌珠日山墓 为方形石砌单室墓(图一,6)^[7],形制与宁城县小塘土沟 M1^[8]、巴林右旗敖包恩格尔墓^[9]相同,与哈喇海沟墓呈圆角方形相比,年代可能略晚。

柳条沟 M1 位于辽宁北票市西官营子乡柳条沟村西,为小型砖筑火葬墓,葬具为木匣^[10]。所出陶大口罐,颈部内壁不是内弧形,而是内凸的尖角形,与虎吐路墓相似,整体形态及纹饰则与乌斯吐墓大口罐比较接近。陶鼓腹罐形制与乌斯吐墓、呼斯淖墓出土同类器相同。M1 所出陶罐颈部饰水波纹。这种纹饰也见于朝阳市二三四医院隋唐墓 M3 出土 B 型陶罐^[11]上,但 M1 所出陶罐的形制与所饰水波纹,更接近哈喇海沟墓所出大口罐。因此,柳条沟 M1 的年代约为建辽前后。

水泉沟墓 位于辽宁省阜新县国华乡水泉屯,圆形石室墓,方向 165 度。墓壁采用当地天然薄石板垒砌,叠涩起券成穹隆顶^[12]。从墓中出土的“真子飞霜”铜镜、白瓷碗碟等器物来看,该墓的年代为唐末辽初。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辽宁康平陆续发现一批契丹墓葬^[13]。胜利乡马莲屯 M1 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尸骨仰身直肢葬,头向北。出土物包括篦点纹陶罐、小铁刀等,墓坑头箱两侧置一堆羊骨(图一,7)。马莲屯 M2 的墓制、葬式与 M1 相同,出土陶壶和双鱼铜牌饰(图一,8)。在

[1] 赤峰市博物馆、松山区文物管理所:《赤峰市哈喇海沟辽墓清理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2008 年第 2 期。

[2] 云瑶、日平:《黑龙江省大庆市沙家窑发现的辽代墓葬》,《北方文物》1991 年第 2 期。

[3] 敖汉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敖汉旗沙子沟、大横沟辽墓》,《考古》1987 年第 10 期。

[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阜新市文物组:《阜新南皂力营子一号辽墓》,《辽海文物学刊》1992 年第 1 期。

[5]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 年第 1 期。

[6] 乔梁:《契丹陶器的编年》,《北方文物》2007 年第 1 期。

[7] 巴林右旗博物馆:《巴林右旗乌珠日山发现一座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 年第 2 期。

[8]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城县小塘土沟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 年第 1 期。

[9]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巴林右旗敖包恩格尔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

[10] 冯永谦:《北票柳条沟辽墓》,中国考古集成编委会:《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辽》(三),北京出版社,1997 年。

[1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朝阳自来水管工地墓葬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93 年第 1 期。

[12] 阜新市博物馆筹备处:《辽宁阜新县契丹辽墓的清理》,《考古》1995 年第 11 期。

[13] 张少青:《辽宁康平发现的契丹、辽墓概述》,《北方文物》1988 年第 4 期。

马莲屯 M1 东 30 米处发现骨灰罐遗迹。罐呈鼓形，通身施滚轮压印篦齿纹。海洲乡 M1 为石筑方形单室墓，尸骨葬，头向北。出土有陶砚、陶壶、马辔饰等。海洲乡 M2 为长方形单室砖墓，尸骨葬，头向北。出土有陶壶。海州乡 M3 为方形单室砖墓，尸骨葬，葬式不明（图一，9），征集到陶壶一件，形制与海州乡 M2 所出陶壶相似。沈阳窝堡墓为石筑方形单室墓，征集到陶壶一件。沙金台乡万宝营子墓为石筑单室墓，墓壁用石板立砌而成，底铺石板，上部用石板覆盖。尸骨葬，头向北。出土陶壶等器物。马架子墓为石筑方形单室墓，墓底铺石板，墓顶形制不明。尸骨葬，葬式不清。出土器物有陶壶、铁刀、铁镞等。柳树屯乡泥马窝堡墓为鼓形罐盛骨灰葬，罐体遍施篦齿纹，有盖。方家屯乡后旧门墓亦为鼓形罐盛骨灰葬，罐为泥质灰陶，子母口，原盖已碎。张少青认为这批墓葬属于契丹人遗存，但对各墓年代的判断值得商榷。从葬制葬俗及随葬品形制来看，这批墓葬与西辽河流域的契丹早期墓葬有相似性，基本上都属于契丹建辽前的遗存，个别墓葬的年代可能晚至辽初。

除上述墓葬外，内蒙古东南部还发现一批辽初墓葬，如南皂力营子 M1、西水地墓^{〔1〕}、沙子沟 M1、克什克腾旗二八地 M1^{〔2〕}等，所出瓜棱壶、长颈壶等器物保留着契丹早期陶器的风格。内蒙古呼伦贝尔西乌珠尔墓群、甘珠尔花墓群^{〔3〕}等，所出陶大口罐与长颈壶具有鲜明的契丹风格，故可将这两类器物作为契丹早期墓葬研究的重要参照物。

二 陶器的类型学分析

契丹早期墓葬所出器物的种类与组合较为简单，陶器主要包括大口罐、鼓腹罐、鼓形罐、长颈罐、瓜棱壶、长颈壶、束颈壶、小口壶、鸡冠壶、扁壶、碗、砚等^{〔4〕}，其中罐与壶是最基本的器物组合。

1. 大口罐 早期契丹民族习见的生活器皿。其基本形态为侈口，束颈，鼓腹，凹底或平底，口径大于底径。纹饰施于口沿、颈部与上腹部，其种类主要有篦点纹、水波纹、口沿外部附加泥条或拉坯形成的凸弦纹等。依据颈部与腹部形态的不同，可分三型。

A 型：长颈，颈部内突呈弧形，口径与腹径相等或略大于腹径，鼓腹，颈部饰凸弦纹一至四周。以颈部的最小径为分界，A 型大口罐的上部高度与下部高度的比例大致为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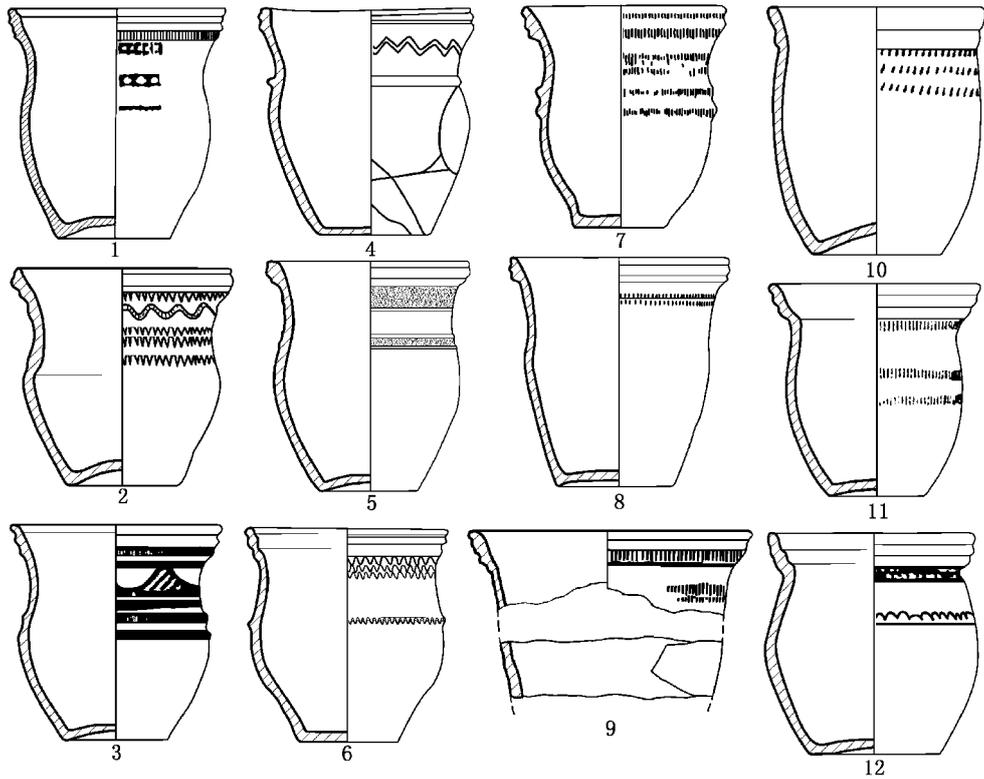
沙家窑墓所出大口罐口沿饰四周凸弦纹，长颈，凹底，年代大致为唐中期。哈喇海沟墓出土的大口罐颈稍短，口沿饰二周凸弦纹，肩施一周凸弦纹，平底。塔布敖包 M1 大口罐口沿饰

〔1〕 于海燕：《赤峰市红山区西水地发现一座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 年第 1 期。

〔2〕 项春松：《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二号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 年第 3 期。

〔3〕 王成、陈凤山：《新巴尔虎左旗甘珠尔花石棺墓群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 年第 1 期。

〔4〕 本文涉及的契丹早期陶器，同一种器物在不同资料中的名称可能不一致，本文将统一名称，如大口罐又称鼓腹罐、侈口罐、敞口罐、广口重唇罐等，统一称作大口罐。另外，契丹早期墓葬出土陶罐与陶壶的器形丰富，为了便于分类，本文对部分器物按其形制作了重新命名，文中不再标注。



图二 大口罐

1-3. A 型 I 式(乌斯吐墓 M1: 1、沙家窑墓、荷叶哈达墓 M1: 1) 4、5. A 型 II 式(哈喇海沟墓、林东街北山坡遗址) 6、7. A 型 III 式(塔布敖包 M1: 3、海力板墓 M1: 4) 8. B 型 I 式(西乌珠尔墓群采集) 9. B 型 II 式(大横沟墓 M1: 2) 10. C 型 I 式(西乌珠尔 M2) 11、12. C 型 II 式(柳条沟 M1、虎吐路墓)

三周凸弦纹,腹部一周凸弦纹,下腹部内收成平底,近似台形。形制与海力板墓所出大口罐相同,后者口沿饰三周凸弦纹,腹饰二周凸弦纹,近台形。海力板墓的年代与赤峰大营子萧沙姑墓^{〔1〕}的年代(959 年)相当,或稍早。因此,依据凸弦纹所施位置、数量和器底形态的变化,可分三式。

I 式:凹底,口沿饰四周凸弦纹。如沙家窑墓、乌斯吐墓、荷叶哈达墓、三道壕墓所出大口罐(图二,1-3)。

II 式:平底,或稍内凹,口沿部饰二至三周凸弦纹,肩饰凸弦纹。如哈喇海沟墓、林东街北山坡遗址出土的大口罐(图二,4、5)。

III 式:平底近似台底,口沿部饰三周凸弦纹,腹饰一至二圈凸弦纹。以塔布敖包 M1、海力板墓所出大口罐为代表(图二,6、7)。

〔1〕 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 年第 3 期。

B型：长颈，颈部内束呈弧形，口径明显大于腹径，腹稍鼓或近似筒形腹。有两件分别出土于西乌珠尔墓群和大横沟墓。西乌珠尔墓群经碳十四测定（树轮校正），年代大体相当于唐中期。大横沟墓的年代相当于辽建国前后。依据腹部形态的变化，可分二式。

I式：腹部稍鼓。如西乌珠尔墓群采集品（图二，8）。

II式：腹部鼓起程度小于I式，近似筒形腹。如大横沟墓 M1：2（图二，9）。

C型：短颈，口部与肩部紧连，颈部极短，内束处呈窄弧形或折角形。仍以颈部最小径为界，其上部高度与其下部高度的比例约为1：4。西乌珠尔墓群 95CXM2 所出大口罐，长颈腹，凹底，年代大致为唐中期。秦家沟征集到的大口罐，腹部变鼓，底部内凹程度小，年代为辽建国前夕。依据腹部与底部形态的变化，可分二式。

I式：束颈较粗，近斜腹，深凹底。如西乌珠尔墓群 95CXM2 出土的大口罐（图二，10）。

II式：束颈较细，鼓腹较I式更明显，浅凹底。如秦家沟墓、柳条沟 M1、虎吐路墓所出大口罐（图二，11、12）。

2. 瓜棱壶 契丹族极具特色的一类器物，在圆鼓腹部施竖向瓜棱纹，故得名。瓜棱壶流行年代较短，大致为契丹建国前后的百余年时间。包括泥质灰陶和泥质磨光黑陶两类，多侈口，卷沿，束颈，溜肩或鼓肩，鼓腹，凹底或平底。除瓜棱纹外，通常在颈部或肩部施一至二周凸棱纹，在近底部施篦点纹。冯恩学按瓜棱壶的口部形式将之分为漏斗形口和盘形口两型^{〔1〕}。巴林左旗林东街北山坡遗址曾发现一件细长颈瓜棱壶，口部形态为喇叭口，与前两型瓜棱壶明显不同。故按口部形态，可分三型。

A型：喇叭口。口沿稍外卷。如乌斯吐墓、呼斯淖墓、大横沟墓、水泉沟墓、南皂力营子 M1、西水地墓等墓葬所出瓜棱壶。前四座墓的年代大致为唐末至辽建国前后，所出瓜棱壶颈粗，器形略显肥硕。南皂力营子 M1 与耶律羽之墓大致同时代，属于辽初。西水地墓的年代为辽早期。两墓所出瓜棱壶颈细，器形稍显瘦长。依据颈部的变化，可分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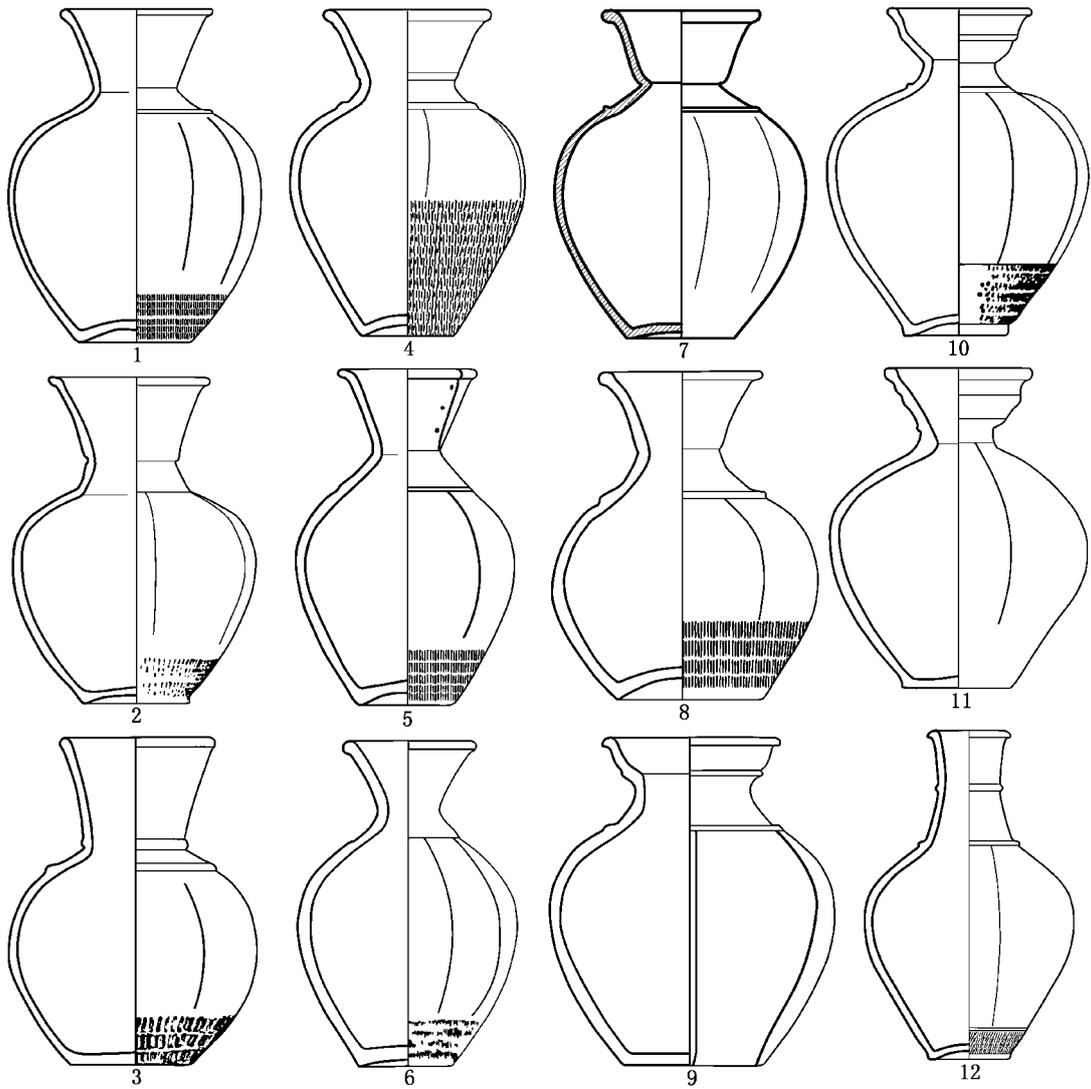
I式：粗颈。如乌斯吐墓、呼斯淖墓、大横沟墓、水泉沟墓、林西锅撑子山^{〔2〕}所出瓜棱壶（图三，1—4）。

II式：细颈，颈部与器型均较I式瘦长。如南皂力营子 M1 和西水地墓所出瓜棱壶（图三，5、6）。

B型：盘口。盘口的深浅不同，底部形态也有变化。荷叶哈达墓与乌日根塔拉墓所出盘口瓜棱壶具有典型性，皆深盘口，凹底。三道壕墓所出瓜棱壶，从器物剖视图看，与A型喇叭口相似。但从器物正视图来看，口部有明显弧度，形态与荷叶哈达墓所出的同式瓜棱壶非常接近，故将其定为盘口型。上述墓葬的年代约为唐晚期，下限可能晚至唐末。塔布敖包 M1 出土A型Ⅲ式大口罐，年代晚于出土A型I式大口罐的荷叶哈达墓、三道壕墓。该墓所出盘

〔1〕 冯恩学：《辽墓初探》，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5年。

〔2〕 汪宇平：《内蒙昭乌达盟印纹陶的时代问题》，《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图三 瓜棱壶

1-4. A 型 I 式(呼斯淖墓、大横沟墓 M1: 1、水泉沟墓、林西锅撑子山采集) 5、6. A 型 II 式(南皂力营子 M1、西水地墓) 7、8. B 型 I 式(乌日根塔拉墓 M1: 1、新丰砖厂墓) 9. B 型 II 式(塔布敖包 M1: 1) 10、11. B 型 III 式(沙子沟墓 M1: 3、二八地 M1) 12. C 型(林东街北山坡遗址采集)

口瓜棱壶,浅盘口,平底,造型与深盘口瓜棱壶稍有不同。沙子沟墓与二八地 M1 的年代均为辽初期,所出瓜棱壶形态相似,盘口、颈与底均与上述墓葬所出瓜棱壶有所不同。因此按盘口与底等部位形态的变化,可分三式。

I 式:盘口较深,粗颈,溜肩,凹底。如三道壕墓、荷叶哈达墓、乌日根塔拉墓、新丰砖厂墓所出瓜棱壶(图三,7、8)。

II 式:盘口较浅,粗颈,鼓肩,平底。如塔布敖包 M1 所出瓜棱壶(图三,9)。

Ⅲ式：盘口较Ⅰ式浅，较Ⅱ式深，盘口斜收成细颈，鼓肩，底台形或近似圈足。如沙子沟墓、二八地 M1 所出瓜棱壶（图三，10、11）。

B 型瓜棱壶各式之间的演变规律为盘口由深变浅，颈部由粗变细，溜肩变为鼓肩，器身的重心逐渐上移，底部则由凹底向平底再向台形（或近似圈足）演变。

C 型：直口。口沿微卷，细长颈。如巴林左旗林东街北山坡遗址所出瓜棱壶（图三，12）。

3. 束颈壶 形制与瓜棱壶基本相同，唯腹部无瓜棱纹。依据口部形态，可分二型。

A 型：喇叭口。西乌珠尔墓群出土的两件均为凹底，年代相当于唐中期。乌珠日山墓、水泉沟墓、柳条沟 M1、海洲乡 M1 所出束颈壶，均为台形底，个别为凹底，年代大致为唐末至辽建国前后。依据底部形态变化明显，可分二式。

Ⅰ式：侈口，束颈，溜肩，鼓腹，凹底。颈部或肩部有一至二周凸棱纹，下腹部施篦点纹。如西乌珠尔墓群出土的束颈壶（图四，1、2）。

Ⅱ式：形制与Ⅰ式基本相同，假圈足，平底，微凹。纹饰较Ⅰ式简略，草率。如乌珠日山墓、水泉沟墓、海洲乡 M1、柳条沟 M1 所出束颈壶（图四，3—5）。

B 型：盘口。形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底部与口部，可分二式。

Ⅰ式：盘口较深，颈短，凹底。下腹部施篦点纹。如新丰砖厂墓和巴彦琥绍墓所出两件束颈壶（图四，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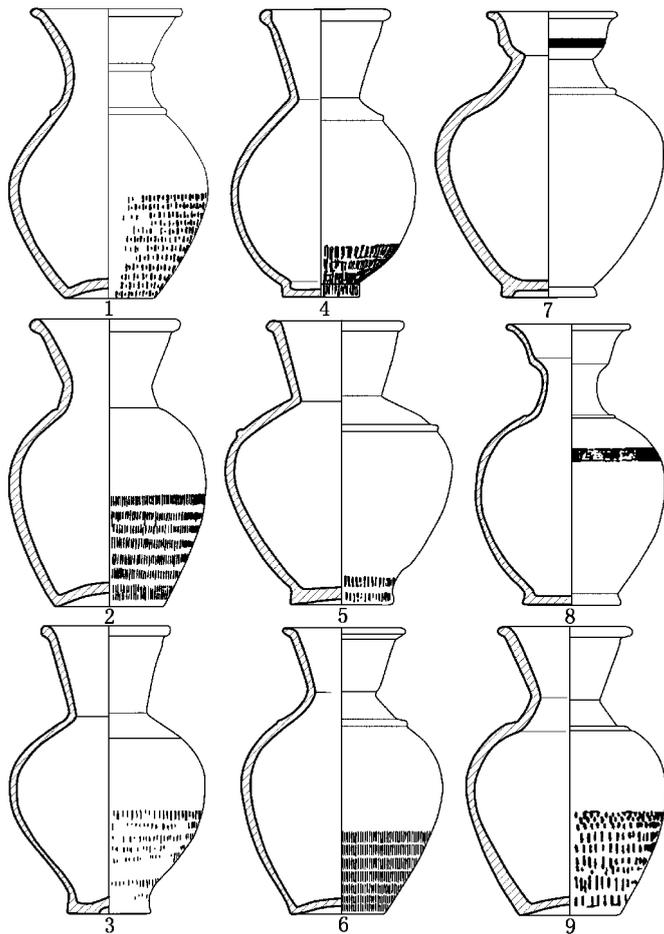
Ⅱ式：盘口较浅，颈变长，台底或圈足，底内凹。如呼斯淖墓、海力板墓与耶律羽之墓所出束颈壶（图四，7、8）。

新丰砖厂墓和巴彦琥绍墓所出 B 型Ⅰ式束颈壶，深盘口，凹底，年代为建辽前。耶律羽之墓所出 B 型Ⅱ式束颈壶，盘口变浅，圈足，年代属辽代前期。B 型束颈壶的质地，Ⅰ式均为陶质，呼斯淖墓与海力板墓所出Ⅱ式均为釉陶，耶律羽之墓所出Ⅱ式则为瓷器。呼斯淖墓与海力板墓的年代稍早于耶律羽之墓，故 B 型束颈壶除形态变化，还存在质地由陶器向釉陶再向瓷器的变化。

4. 长颈壶 契丹族的习用器。建辽前的长颈壶均为泥质灰陶或磨光黑陶，一般在颈部与肩饰二至三周凸棱纹，下腹施较密集的篦点纹。辽建国后出现釉陶。依口部形态，可分二型。

A 型：直口，卷沿，细长颈，深鼓腹，平底或凹底。大横沟墓与林西县锅撑子山遗址所出的长颈壶^{〔1〕}，年代为建辽前后。南皂力营子 M1 的年代与耶律羽之墓（942 年）相当或略早。海力板墓所出提梁式鸡冠壶和盩耳瓷壶的形态分别晚于耶律羽之墓和南皂力营子 M1 所出同类器，而单穿鸡冠壶、圆腹瓷罐、釉陶小罐、花口盘等器物的形态与萧沙姑墓所出同类器相似，

〔1〕 汪宇平：《内蒙昭乌达盟印纹陶的时代问题》，《考古通讯》1955 年第 4 期。



图四 束颈壶

1、2. A 型 I 式(西乌珠尔墓群) 3—5. A 型 II 式(乌珠日山墓、水泉沟墓、柳条沟 M1) 6、9. B 型 I 式(新丰砖厂墓、巴彦琥绍墓 E8002: 3) 7、8. B 型 II 式(耶律羽之墓、呼斯淖墓)

故海力板墓年代大体接近萧沙姑墓(959 年)^{〔1〕}, 晚于南皂力营子 M1。沙子沟 M1 出土单孔有突型鸡冠壶, 属辽穆宗时期(951—969 年), 但晚于海力板墓^{〔2〕}。陈国公主墓的埋葬年代为圣宗开泰七年(1018 年)。库伦 M3 的年代相当于圣宗末期。依据 A 型长颈壶的腹部与底部形态的变化, 可分三式。

I 式: 器形较肥硕, 凹底, 泥质陶, 下腹施较宽的篦点纹带。如大横沟墓、林西锅撑子山、南皂力营子 M1 所出长颈壶(图五, 1—3)。

II 式: 器形较肥硕, 内凹底或平底, 釉陶。如海力板墓出土褐釉与沙子沟 M1 出土墨绿釉长颈壶(图五, 5、7)。

III 式: 器形较修长, 平底, 釉陶。如陈国公主墓和库伦 M3 出土的绿釉长颈壶^{〔3〕}(图五, 4、8)。

B 型: 侈口, 卷沿, 鼓腹, 凹底或平底。西乌珠尔墓群与沙家窑墓分别采集和出土有 B 型长颈壶, 年

代为唐中、晚期。乌日根塔拉墓与巴彦琥绍墓也出土 B 型长颈壶, 年代为建辽前。然乌日根塔拉墓所出者颈较粗, 颈部形态近似西乌珠尔墓群所采集到的 B 型长颈壶, 底径也较大。巴彦琥绍墓所出者颈细, 底径小而平, 形态上更接近于法库叶茂台 M7^{〔4〕}、抚顺光明街 M2^{〔5〕} 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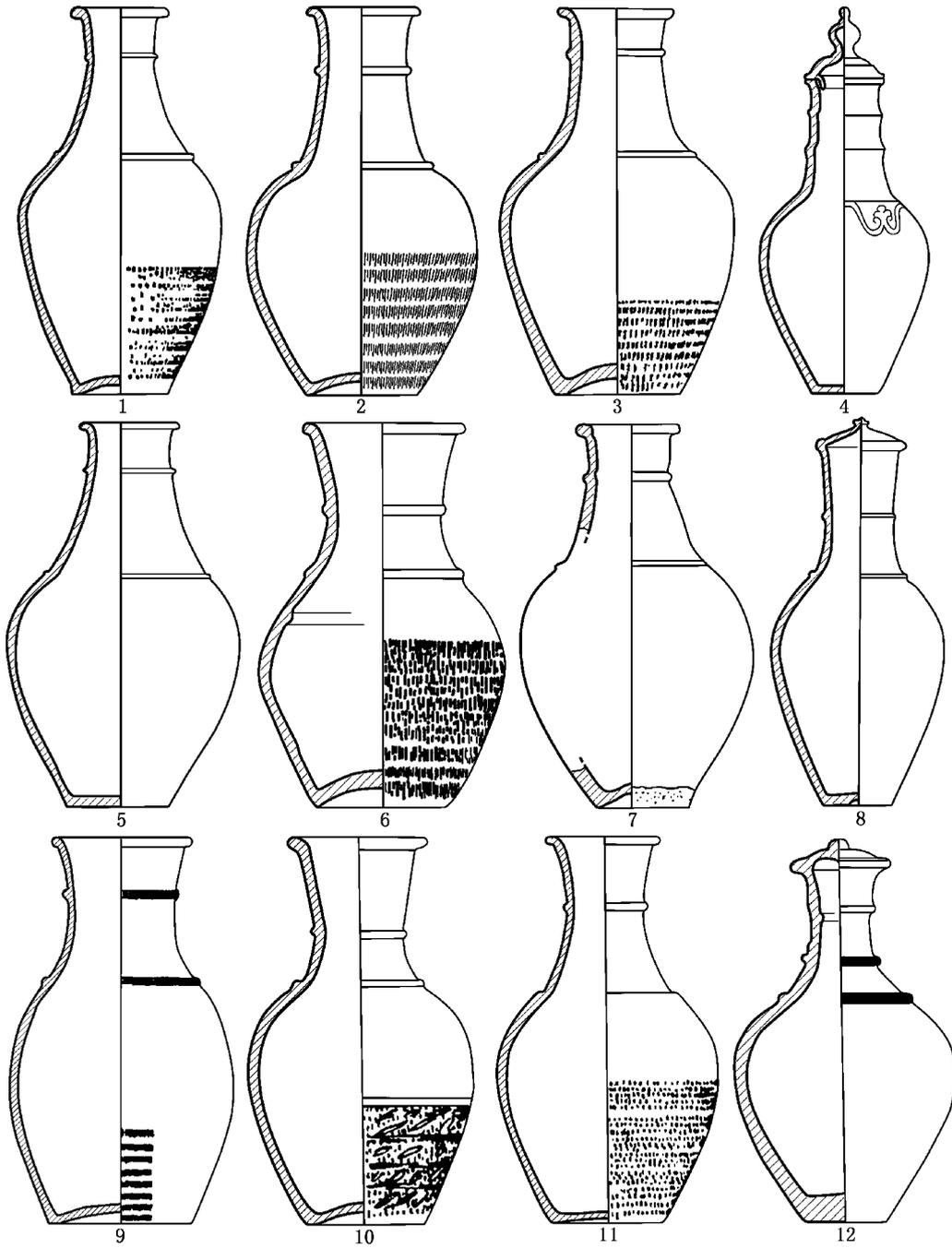
〔1〕 乔梁:《契丹陶器的编年》,《北方文物》2007 年第 1 期。

〔2〕 冯恩学:《辽墓初探》,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5 年。

〔3〕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 年第 11 期;王健群、陈相伟:《库伦辽代壁画墓》,47—55 页,文物出版社,1989 年。

〔4〕 辽宁省博物馆等:《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 年第 12 期。该墓所出长颈壶图片转引自彭善国:《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106 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 年。

〔5〕 抚顺市博物馆:《抚顺市光明街辽墓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7 年第 2 期。



图五 长颈壶

1—3. A型Ⅰ式(大横沟墓 M1: 46、林西锅撑子山采集、南皂力营子 M1) 4、8. A型Ⅲ式(库伦 M3、陈国公主墓 Q2) 5、7. A型Ⅱ式(沙子沟 M1: 6、海力板墓 M1: 23) 6. B型Ⅰ式(西乌珠尔墓群采集) 9. B型Ⅱ式(乌日根塔拉墓 M1: 2) 10—12. B型Ⅲ式(巴彦琥绍墓 E8002: 2、E8002: 1、叶茂台 M7)

出同型长颈壶。后两者约为辽圣宗时期。所以乌日根塔拉墓所出长颈壶为 B 型较早形式,巴

彦琥绍墓所出者为较晚形式。依据器口、颈与底等部位形态的变化,可分三式。

I 式:器形矮胖,侈口,颈较粗,溜肩,圆鼓腹,深凹底。腹部最大径在腹的中部,器身重心比较靠下。如西乌珠尔墓群和沙家窑墓所出长颈壶(图五,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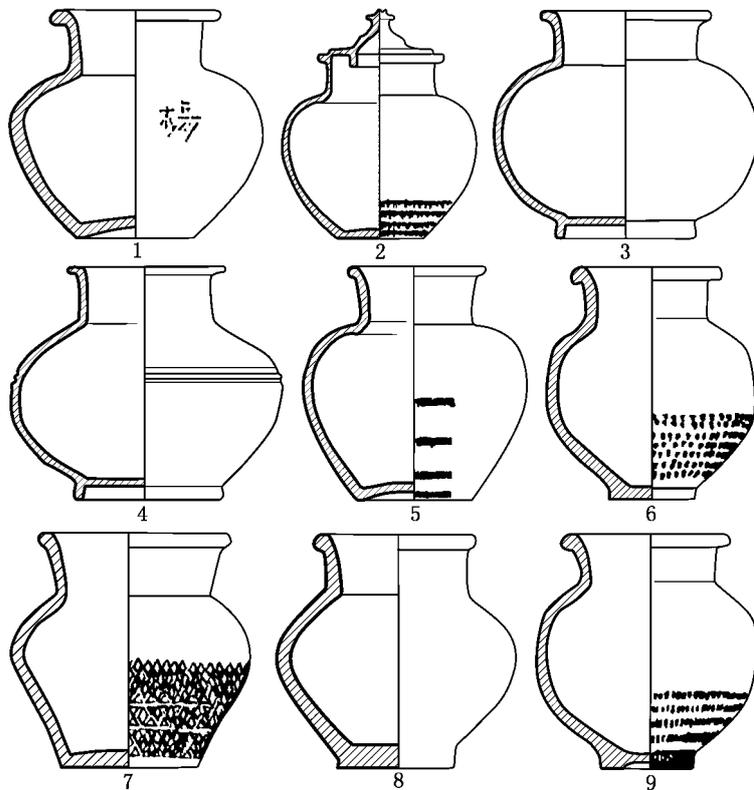
II 式:器形较 I 式长,溜肩,鼓腹,浅凹底。如乌日根塔拉墓所出长颈壶(图五,9)。

III 式:器形修长,小侈口,细颈,鼓肩,浅凹底或平底。腹部最大径靠近肩部,器身重心上移。辽建国前后有巴彦琥绍墓出土的两件长颈壶;辽早、中期有叶茂台 M7 和光明街 M2 所出长颈壶(图五,10—12)。

长颈壶形态的变化比较明显,由较肥硕向修长演变,B 型颈部由粗变细最为明显;肩部由溜肩逐渐变为鼓肩;凹底由深到浅,逐渐变成平底,最后为圈足;陶质由泥质向釉陶和瓷器转变;纹饰则由篦点纹为主,变为素面或釉色装饰。辽中期前后,陶质长颈壶被瓷质长颈瓶取代。

5. 鼓腹罐 基本形制是在鼓腹之上加竖颈,有明显的卷沿,纹饰以篦点纹为主,全部施于下腹部。依据其口部形态,可分二型。

A 型:直口,直颈。柳条沟 M1、呼斯淖墓出土 A 型鼓腹罐的年代为建辽前。萧沙姑墓和



图六 鼓腹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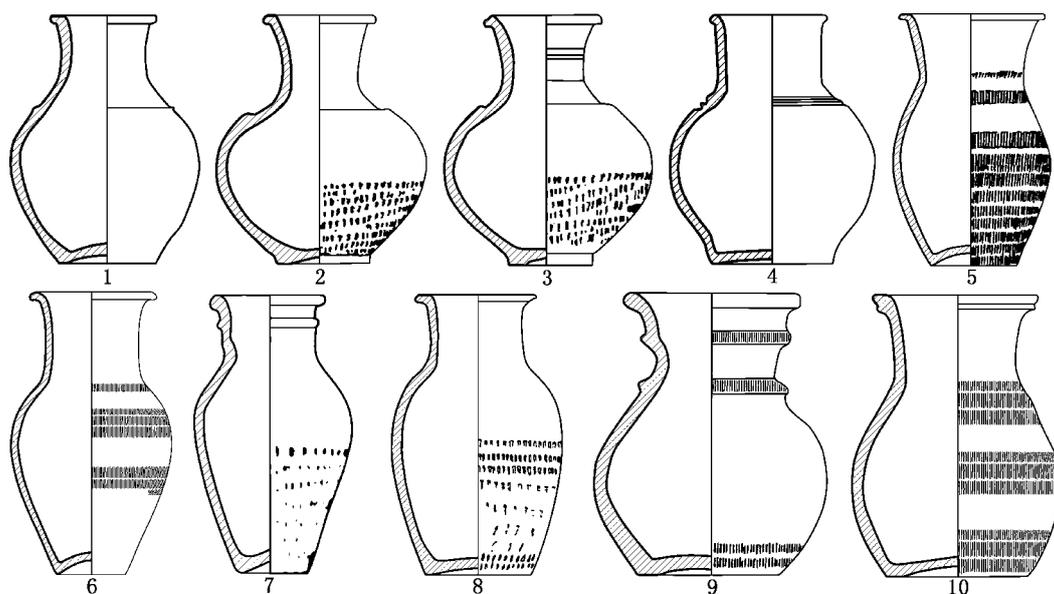
1、2. A 型 I 式(柳条沟 M1、呼斯淖墓) 3、4. A 型 II 式(萧沙姑墓、代钦塔拉 M3 : 184) 5. B 型 I 式(乌斯吐墓 M1 : 3) 6、8、9. B 型 III 式(马莲屯 M1、余粮堡墓、马莲屯 M1) 7. B 型 II 式(塔布敖包 M2 : 1)

代钦塔拉 M3 所出 A 型鼓腹罐形态相同,属于辽早期。根据它们的相对早晚关系,结合 A 型鼓腹罐底部形态的变化,可分二式。

I 式:鼓肩,下腹弧收,凹底或平底。柳条沟 M1 和呼斯淖墓所出三件鼓腹罐均为泥质灰陶,素面或下腹部施篦点纹(图六,1、2)。

II 式:溜肩,球形腹,下腹弧收程度大于 I 式,圈足。如萧沙姑墓和代钦塔拉 M3 所出的白釉和绿釉鼓腹罐(图六,3、4)。

B 型:侈口,束颈。乌斯吐墓与塔布敖包 M1 分别出土 A 型 I 式和 A 型 III 式大口罐,乌斯吐墓的年代早于塔布敖包 M1。塔布敖包



图七 长颈罐、大口壶

1. A型I式长颈罐(甘珠尔花 M1) 2,3. A型II式长颈罐(万宝营子墓) 4. B型长颈罐(塔布敖包 M1:2) 5. A型I式大口壶(西乌珠尔墓群) 6,7. A型II式大口壶(林东街北山坡遗址、林西锅撑子山) 8. A型III式大口壶(甘珠尔花 M3) 9,10. B型大口壶(秦家沟墓—秦 1601、虎吐路墓—沙 5M1:2)

M1、M2 的年代应相同，则乌斯吐墓的年代早于塔布敖包 M2。余粮堡墓出土单孔无突型鸡冠壶^{〔1〕}，年代大致在世宗至景宗时期^{〔2〕}。该墓所出鼓腹罐的形制与塔布敖包 M2 所出者相近，唯底部为台形。依底部形态，可分三式。

I 式：凹底，鼓肩，鼓腹。如乌斯吐墓所出鼓腹罐(图六，5)。

II 式：平底，溜肩，突鼓腹。如塔布敖包 M2 所出鼓腹罐(图六，7)。

III 式：台底，溜肩，圆鼓腹。如余粮堡墓与马莲屯 M1 所出鼓腹罐(图六，6、8、9)。

6. 长颈罐 在颈部或肩部施一至数周凸棱纹，肩部以下施篦点纹，整体形态与 A 型 II 式束颈壶和 B 型 I 式长颈壶有相似之处。依据其颈部的形态，可分二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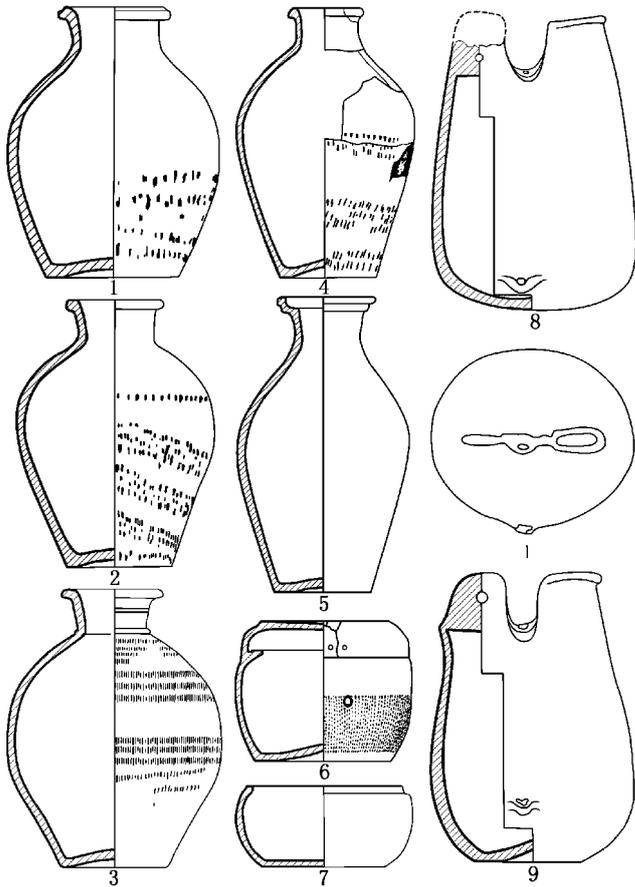
A 型：束颈，颈部剖面呈倒梯形。荷叶哈达墓所出长颈罐的腹部以下残，从腹部以上的形态来看，其形制应与甘珠尔花 M1 所出者相似，年代为辽建国前。万宝营子墓所出两件长颈罐，底部为台形。从大口罐、束颈壶与鼓腹罐等器物的底部由凹底向台形底演变的规律来看，这两件器物的年代显然晚于荷叶哈达墓与甘珠尔花 M1 所出者。依据底部形态，可分二式。

I 式：溜肩，鼓腹，凹底。如荷叶哈达墓、甘珠尔花 M1 所出长颈罐(图七，1)。

II 式：鼓肩，圆鼓腹，台形底。如万宝营子墓出土的两件长颈罐(图七，2、3)。

〔1〕 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通辽县余粮堡辽墓》，《北方文物》1988 年第 1 期。

〔2〕 冯恩学：《辽代鸡冠壶类型学探索》，《北方文物》1996 年第 4 期。



图八 小口壶、鼓形罐与鸡冠壶

1-5. 小口壶(海洲乡 M2、海洲乡 M3、林东街北山坡遗址、马架子墓、沈阳窝堡墓) 6,7. 鼓形罐(双井沟墓 MB: 1、后旧门墓) 8,9. 鸡冠壶(呼斯淖墓、余粮堡墓)

8. 小口壶 小口,卷沿,束颈,溜肩,鼓腹斜收,凹底。腹以下施较疏松的篦点纹。如海洲乡 M2、海洲乡 M3、林东街北山坡遗址、马架子墓和沈阳窝堡墓所出小口壶。其形态由矮胖向瘦长演变,口部由侈口变成盘口(图八,1-5)。

9. 鼓形罐 有盖,平顶,上施暗纹。圆唇,子母口,圆腹,凹底或平底。施篦点纹,个别为素面。从双井沟墓、马莲屯墓、后旧门墓、泥马窝堡墓出土的鼓形罐来看,内殓骨灰,属葬具(图八,6,7)。

契丹早期墓葬出土的陶器还有鸡冠壶(图八,8,9)、扁壶、碗、双耳罐、砚等,由于数量极少,无法进行类型学分析。

三 墓葬分期与文化特征

以上对契丹早期墓葬的年代及出土主要陶器的类型学分析,为探讨契丹早期墓葬的分

B型:直颈,颈部的剖面呈长方形。塔布敖包 M1 所出长颈罐,直颈,口微侈,鼓腹,下腹弧收,微凹底(图七,4)。

7. 大口壶 大口,卷沿,长颈,溜肩,鼓腹,凹底。纹饰集中在腹部,主要为篦点纹,有的在颈部施凸棱纹。依据腹部的形态,可分二型。

A型:鼓腹,凹底。依据口部形态等变化,可分三式。

I式:侈口,口径与腹径大致相等。颈部以下遍饰规整的篦点纹。如西乌珠尔墓群所出大口壶(图七,5)。

II式:侈口,口径腹径。颈部以下篦点纹面积减小、制作潦草,凹底开始变浅。如林东街北山坡遗址、海洲乡 M2 所出者大口壶(图七,6,7)。

III式:直口,口径小于腹径,纹饰草率,浅凹底。如甘珠尔花 M3 所出大口壶(图七,8)。

B型:扁鼓腹,平底稍内凹。如秦家沟墓和虎吐路墓所出大口壶(图七,9,10)。

期、文化特征以及契丹早期丧葬习俗等提供了依据。

各类器物的型式演变代表了相对早晚关系,其演变序列如下。

大口罐 A 型 I 式—A 型 III 式提供四组序列:乌斯吐墓→哈喇海沟墓→塔布敖包墓;荷叶哈达墓→哈喇海沟墓→塔布敖包墓;三道壕墓→哈喇海沟墓→塔布敖包墓;沙家窑墓→哈喇海沟墓→塔布敖包墓。

瓜棱壶 B 型 I 式、B 型 II 式提供四组序列:乌日根塔拉墓→塔布敖包墓;荷叶哈达墓→塔布敖包墓;三道壕墓→塔布敖包墓;新丰砖厂墓→塔布敖包墓。

束颈壶 B 型 I 式、B 型 II 式提供两组序列:巴彦琥绍墓→呼斯淖墓;新丰砖厂墓→呼斯淖墓。

长颈壶 B 型 I 式—B 型 III 式提供一组序列:沙家窑墓→乌日根塔拉墓→巴彦琥绍墓。

鼓腹罐 B 型 I 式—B 型 III 式提供一组序列:乌斯吐墓→塔布敖包墓→马莲屯 M1。

长颈罐 A 型 I 式、A 型 II 式提供一组序列:荷叶哈达墓→万宝营子墓。

大口壶 A 型 I 式、A 型 II 式提供一组序列:海洲乡 M1→秦家沟墓。

根据 A 型大口罐和 B 型鼓腹罐提供的序列,可将相关墓葬分成具有早晚关系的四组。第一组包括乌斯吐墓、荷叶哈达墓、三道壕墓、沙家窑墓,第二组为哈喇海沟墓,第三组为塔布敖包墓,第四组为马莲屯 M1。大横沟墓与乌斯吐墓同出 A 型 I 式瓜棱壶,故归入第一组。从 B 型瓜棱壶和 B 型长颈壶提供的序列综合来看,乌日根塔拉墓晚于沙家窑墓且早于塔布敖包墓,则乌日根塔拉墓应归入第二组。从瓜棱壶 B 型的分式来看,新丰砖厂墓与荷叶哈达墓、三道壕墓、乌日根塔拉墓同出 I 式盘口瓜棱壶。新丰砖厂墓 B 型 I 式瓜棱壶深凹底,重心偏下,形制比乌日根塔拉墓原始,故新丰砖厂墓年代早于乌日根塔拉墓,应归入第一组。巴彦琥绍墓与新丰砖厂墓同出 B 型 I 式束颈壶,但在长颈壶 B 型序列中,巴彦琥绍墓晚于乌日根塔拉墓。故巴彦琥绍墓应归入第三组。呼斯淖墓出土 B 型 II 式束颈壶晚于巴彦琥绍墓,故应归入第四组。乌珠日山墓、水泉沟墓、柳条沟 M1 与海洲乡 M1 同出 A 型 II 式束颈壶。柳条沟 M1、虎吐路墓与秦家沟墓同出 C 型 II 式大口罐。根据 A 型大口壶提供的序列,可以把上述几座墓葬分成早晚两部分。依据晚期墓葬可能出土早期遗物的情况,把柳条沟 M1 归到晚期部分中。水泉沟墓与乌斯吐墓、大横沟墓同出 A 型 I 式瓜棱壶,故将早期部分归入第一组。柳条沟 M1 与呼斯淖墓同出 A 型 I 式鼓腹罐,则将晚期部分归入第四组(表一)。

表一 契丹早期墓葬的分组

| 组 别 | 墓 葬 |
|-----|---|
| 一组 | 乌斯吐墓、荷叶哈达墓、三道壕墓、沙家窑墓、新丰砖厂墓、大横沟墓、乌珠日山墓、水泉沟墓、海洲乡 M1 |
| 二组 | 哈喇海沟墓、乌日根塔拉墓 |
| 三组 | 塔布敖包墓、巴彦琥绍墓 |
| 四组 | 马莲屯 M1、呼斯淖墓、柳条沟 M1、虎吐路墓、秦家沟墓 |

据表一可初步将契丹早期墓葬划分为四期。由于缺乏墓志铭等纪年材料,各期的绝对年

代尚无法确定。但从上文对陶器的类型学分析中看到,契丹早期墓葬所出器物的年代均晚于西乌珠尔墓群所出的器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曾对西乌珠尔 86M2 木棺进行碳十四测定(标本 ZK-2232)^{〔1〕},结合出土器物与相关墓葬所出同类器的对比,基本上可以确定该墓地年代为唐中期。故契丹早期墓葬分期的上限不超过七至八世纪,下限至辽建国前(十世纪初),即契丹早期墓葬四期总的年代范围大致为九至十世纪左右。

上文通过对几座契丹早期墓葬的分析,简单归纳出几项契丹早期墓葬的主要特征,作为考定其他契丹早期墓葬的依据。下面结合契丹早期墓葬的分期,试对其文化特征作进一步分析。

墓葬种类 有土坑竖穴墓、石室墓、砖室墓等。基本以土坑竖穴墓为主,石室墓次之,砖室墓最少。土坑墓一般无葬具,少数使用木棺或石棺。石棺四壁树立石板,顶部用大石板封盖。石室墓一般用不规则石板或石片叠砌而成,叠涩顶。砖室墓以大横沟墓为例,单室,四壁到一定高度起券,墓顶用石板封盖。总体来看,契丹人早期墓室的形制不甚规整,结构简单、原始。

墓葬方向 分为西北、正北、东北、东南、西南等。内蒙古东南部和黑龙江地区发现的契丹早期墓葬,墓向一般为西北向或正北向。辽宁西部的契丹早期墓葬主要为东南向或西南向。

葬式 包括火葬和尸骨葬。火葬墓的骨灰一般直接放在墓坑底或装殓在陶罐、木匣中。乌斯吐火葬墓的骨灰堆放在墓坑底部,上面覆盖几层桦树皮,与西乌珠尔 95M3 墓主人尸骨上覆盖桦树皮的做法相似^{〔2〕}。陶骨灰罐多在器壁凿若干小孔,应是契丹原始葬俗的子遗。尸骨葬主要为仰身直肢葬,个别为侧身屈肢葬。塔布敖包 M2 为侧身屈肢葬,头向北,面西。这种葬式在契丹早期墓葬中比较少见,与呼伦贝尔地区的谢尔塔拉室韦墓地的葬式相似^{〔3〕}。

随葬陶器 包含夹砂和泥质两大陶系^{〔4〕}。罐与壶是最基本的器物组合,罐主要是大口罐,壶则包括瓜棱壶、长颈壶、束颈壶等。大口罐最具特征,均为夹砂陶,有的掺杂云母,个别器表上留有烟炱,是契丹人日常所用的炊器。陶壶一般为泥质陶或细泥陶,胎质细腻,制作讲究,应是契丹人早期使用的重要容器。由此可见,在契丹早期陶器的两大陶系中,夹砂陶主要是大口罐这一类的炊器,泥质陶则主要是陶壶以及其他形制的陶罐。这两类陶器都以凹底为显著特征,有的在底部中央压印图案或符号。纹饰均以凸弦纹和篦点纹为主,凸弦纹施在口部、颈部或肩部,篦点纹则施在两类器物的不同部位。陶壶通常在下腹施篦点纹。同样作为容器的鼓腹罐、双耳罐及鼓形罐等,其篦点纹也都施在下腹部。大口罐作为炊器,下腹用以烘烤,篦点纹主要施在上腹部。陶器功能的不同决定了它们在材质和纹饰的差异。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五)》,《考古》1988年第7期。

〔2〕 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古墓葬调查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第2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等:《海拉尔谢尔塔拉墓地》,科学出版社,2006年。

〔4〕 张柏忠:《契丹早期文化探索》,《考古》1984年第2期。

陶器形制有明显变化。其底部形态, A 型 I 式大口罐属一期为深凹底, II 式属二期变为平底或浅凹底, III 式属三期又演变成台形底。三道壕墓、荷叶哈达墓与新丰砖厂墓出土的 B 型 I 式瓜棱壶属一期, 凹底, 新丰砖厂墓所出者为深凹底, 塔布敖包 M1 所出 II 式属三期, 变为大平底。B 型鼓腹罐的 I、II、III 式分别属于一期、三期、四期, 底部形态依次由凹底变为平底再变为台形足。器身变化也比较明显。乌日根塔拉墓出土的 B 型 II 式长颈壶属二期, 颈粗, 体肥; 巴彦琥绍墓出土 III 式长颈壶属三期, 颈部变细, 器身变得瘦高。小口壶器身的变化显著, 海洲乡墓所出者器身矮胖, 到马架子墓和沈阳窝堡墓所出者, 器身已变得高瘦。从纹饰上看, A 型 I 式大口罐的凸弦纹施于口沿外壁, II 式除口沿外, 还在肩部施凸弦纹, III 式则在口沿之外, 将凸弦纹施于腹部。凸弦纹所处位置的变化恰好与器底形态的变化相一致。篦点纹是契丹早期陶器表面上最主要的纹饰, 前期的篦点纹较为密集规整, 后期则显得相对稀疏和草率。

四 契丹早期葬俗及其演变

上文探讨的契丹早期墓葬都属于土葬墓, 但据文献记载, 契丹最早流行的是树葬习俗。唐宋典籍对此有简略的记载(表二)。

| 史 籍 | 史 料 |
|-----------|--|
| 《隋书·契丹传》 | 其俗颇与靺鞨同。……父母死而悲哭者, 以为不壮, 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 经三年之后, 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而祝曰: “冬月时, 向阳食。若我射猎时, 使我多得猪鹿。” |
| 《北史·契丹传》 | 父母死而悲哭者, 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 经三年后, 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 “冬月时, 向阳食。若我射猎时, 使我多得猪鹿。” |
| 《旧唐书·契丹传》 | 其俗死者不得作冢墓, 以马驾车送入大山, 置之树上, 亦无服纪。子孙死, 父母晨夕哭之; 父母死, 子孙不哭。其余风俗与突厥同。 |
| 《新唐书·契丹传》 | 风俗与突厥大抵略侔。死不墓, 以马车载尸入山, 置于树颠。子孙死, 父母旦夕哭; 父母死则否, 亦无丧期。 |

(一) 契丹树葬习俗的起源

据表二, 北朝以来契丹族人死后不作墓冢, 采用树葬, 将死者尸体载入大山, 置于树上, 三年之后收其遗骸火化。这种丧葬方式是本民族的原始葬俗, 还是受其他民族的影响而形成的, 需要依据相关文献加以考证。

《隋书·契丹传》: “其(契丹)俗颇与靺鞨同。”靺鞨属于东北地区的肃慎—勿吉族系。肃慎、勿吉与靺鞨均采用土葬, 《晋书·肃慎氏传》载: “死者其日即葬之于野, 交木作小椁, 杀猪积其上, 以为死者之粮。”《魏书·勿吉传》载: “其父母春夏死, 立埋之, 冢上作屋, 不令雨湿。”《旧唐书·靺鞨传》: “死者穿地埋之, 以身衬地, 无棺敛之具, 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契丹的树葬习俗显然与靺鞨葬俗不同。新旧《唐书》均言契丹风俗有同于突厥者。《隋书·突厥传》载:

“有死者，……于是择日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突厥火葬墓^{〔1〕}，也印证了文献的记载。契丹人“收其骨而焚之”和突厥人“置尸马上而焚之”的葬俗确有相似之处。契丹在突厥汗国建立后曾长期受其统治，文化习俗也受其影响，葬俗也不例外。但火化遗骸本身似与之无关。首先，契丹火化遗骸的做法当早于突厥火葬习俗，至少在契丹受到突厥文化习俗影响以前就已流行。其次，《旧唐书》在交待完契丹树葬习俗之后，又言“其余风俗与突厥同”。“其余风俗”是指树葬以外的文化习俗，即契丹风俗中与突厥相同者不包括树葬。最后，契丹人将死者尸体悬置于树上的丧葬方式与突厥葬俗明显不同。树葬习俗的根源仍须从契丹族源民族的葬俗中探寻。

契丹族源较为复杂，鲜卑宇文部当是其一，而宇文部源自南匈奴^{〔2〕}。关于匈奴葬俗，《史记·匈奴列传》载：“其送死，有棺槨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有棺槨，应采用尸骨葬。匈奴内部成分复杂，不同地区的匈奴墓葬虽有一定差异，但葬制上的共性也很明显。目前已发现匈奴墓葬数千座，已发掘近千座。这些墓葬基本上都属于尸骨葬。有些墓葬内发现炭粒或火堆遗迹，但不是火化的骨灰，似与棺槨封闭后再用火焚烧的葬仪有关^{〔3〕}。

关于鲜卑葬俗，《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乌桓）俗贵兵死，斂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纓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鲜卑与乌桓同属东胡分支，《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则鲜卑亦流行土葬，且有焚烧死者所乘马衣物的葬仪。如《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载：“高宗崩，故事：国有大丧，三日之后，御服器物一以焚烧，百官及中宫皆号泣而临之。”《魏书·高允传》也说：“今国家营葬，费损巨亿，一旦焚之，以为灰烬。”至 2006 年止，考古发现的鲜卑墓葬有六十余处，已发掘墓葬五百余座^{〔4〕}。它们在墓葬形制与随葬品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基本上都是仰身直肢的尸骨葬。

乌桓与鲜卑虽有焚烧棺槨或死者遗物的葬仪，但均流行尸骨葬，无火化死者尸骨的习俗。最后是宇文部的葬俗，文献中没有找到相关记载。考古上也未发现族属明确的宇文部遗存。田立坤认为：“宇文鲜卑的遗存至少应该具有匈奴和鲜卑两种文化因素”^{〔5〕}。宇文部属于鲜卑化的匈奴人，势必会在文化上同时表现出匈奴文化与鲜卑文化的特征。按照这一思路，许永杰认为察右后旗二兰虎沟墓群应属于宇文鲜卑的遗存^{〔6〕}。乔梁认为分布在内蒙古中部一

〔1〕 张文平：《突厥考古学文化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 年第 3 期。

〔2〕 《魏书·匈奴宇文莫槐传》在宇文莫槐名字前缀上“匈奴”二字，表明宇文氏乃匈奴人，传文言宇文莫槐“出于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远属也。”《魏书·宇文福传》及《宇文忠之传》皆言宇文氏乃南匈奴之远属。《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亦载：“宇文氏出自匈奴南单于之裔。”宇文部原居于阴山东部，大致三世纪前后东迁至西辽河流域，因与鲜卑杂处，遂鲜卑化。

〔3〕 单月英：《匈奴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 年第 1 期。

〔4〕 孙危：《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1—6 页，科学出版社，2007 年。

〔5〕 田立坤：《三燕文化遗存的初步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1 年第 1 期。

〔6〕 许永杰：《鲜卑遗存的考古学考察》，《北方文物》1993 年第 4 期。

带的二兰虎沟、三道湾等墓葬遗存，“可以同檀石槐至柯比能阶段的鲜卑大联盟中的早期东部鲜卑相对应”〔1〕。虽然他没有指明二兰虎沟等墓群是宇文鲜卑的遗存，但东汉晚期分布在内蒙古中部的早期东部鲜卑正是宇文部。卓资县石家沟墓群分布在内蒙古中部，时代亦为东汉晚期，“该墓群既有拓跋鲜卑的文化内涵，又有受到匈奴文化及汉文化影响的东部鲜卑文化的特征”〔2〕。该墓群亦应为宇文部的文化遗存。上述墓葬遗存基本上都属于尸骨葬，但在石家沟墓群中发现了火葬现象。

综上所述，宇文部的火葬习俗可能就是契丹树葬后火化遗骸做法的直接来源，但不排除也受到匈奴、乌桓及鲜卑的焚烧棺槨与死者遗物习俗影响的可能性。上文考证了契丹人火化尸骨习俗的来源，至于契丹人将死者尸体置于树上，当与其崇拜山川思想有着密切关系。

山川崇拜是古代民族的一项重要信仰。游牧或渔猎民族由于受到生业方式的影响，可能对山川树木的崇拜更甚。契丹人有着浓郁的崇拜山岳的思想。《辽史·仪卫志二》载：“辽国以祭山为大礼。”自遥辇胡刺可汗制祭山仪至辽代，祭山仪作为吉仪中的首仪，成为契丹人最重要的祭祀大礼。契丹崇山思想的文化内涵深邃，内容丰富，核心是对山神的敬畏，或言契丹人相信族人死后魂归黑山。《辽史·礼志六》：“冬至日，……天子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谓国人魂魄，其神司之，犹中国之岱宗云。”《使辽录》：“虏中黑山，如中国之岱宗，云虏人死，魄归此山。”武彗《燕北杂记》亦云：“言契丹死，魂为黑山神管系。”〔3〕契丹人死后，魂归黑山。这应该是契丹人在族人死后将其送往大山（树葬）的意图所在，即希望死者的灵魂通过尸体所寄放之山而通往灵魂的最终归宿——黑山。高大的树木无疑是通往神山或天堂的最佳媒介，所以要将死者尸体置于树上。

契丹每岁祭祀木叶山与黑山，都会举行焚烧仪式。《辽史·礼志六》载：“岁十月，五京进纸造小衣甲、枪刀、器械万副。十五日，天子与群臣望祭木叶山，用国字书状，并焚之。……每岁是日（冬至），五京进纸造人马万余事，祭山（黑山）而焚之。俗甚严畏，非祭不敢近山。”契丹这种焚烧纸造人马、衣甲的习俗，显然与乌桓、鲜卑焚烧死者生前所乘马、衣物有直接继承关系，不同的是由焚烧实物变成纸明器。契丹人的崇山观念与仪式皆来源于乌桓与鲜卑。《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乌桓人在族人死后，焚烧一肥犬，“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契丹人之黑山当与乌桓之赤山同，都是族人死后灵魂的居所。契丹人树葬习俗源于对大山的崇拜，其崇山思想又源于其祖先乌桓及鲜卑的崇山思想，故其树葬与乌桓及鲜卑的崇山有着密切联系。但将尸体置于树上而三年后焚烧之，当源自其直系祖先宇文部的火葬习俗，也可能与乌桓及鲜卑焚烧死者衣物的仪式有间接关系。

〔1〕 乔梁：《鲜卑遗存的认定与研究》，《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

〔2〕 内蒙古博物馆：《卓资县石家沟墓群出土资料》，《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2期。

〔3〕 武彗：《燕北杂记》，厉鹗《辽史拾遗·庆州玄宁军上节度使》引，中华书局，1985年。

北朝时期的室韦与奚也流行树葬^{〔1〕}。契丹、奚和室韦同源,三者均曾流行的树葬当起源于共同祖先的丧葬习俗与宗教信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献记载室韦流行树葬,却没有于三年后焚烧遗骨的习俗,且目前认定的室韦墓葬均为尸骨葬^{〔2〕}。契丹的树葬有三年后焚烧遗骨的习俗,且契丹早期墓葬和辽代奚人墓葬仍保留着火葬习俗^{〔3〕}。这说明三个民族的树葬习俗来自鲜卑及乌桓对大山的崇拜,但契丹(包括奚)于树葬三年后焚烧遗骨当源自其直系祖先宇文部的火葬习俗。室韦并不出自宇文部,故无火化尸骨的习俗。东胡族系的树葬分化成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其一,室韦族将尸体悬置在树上或搭建的木棚上^{〔4〕},不火化遗骨;其二,契丹与奚把尸体置于树上,三年后将遗骨火化,即将树葬与火葬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葬俗。

(二)契丹土葬习俗的兴起与发展

契丹人最初流行树葬,后来改用土葬。上文通过对相关墓葬出土陶器的排序与对比,将契丹早期墓分为四期,大致年代为唐中晚期。这些墓葬只是考古发现的早期契丹墓,而不是年代最早的契丹墓。换言之,契丹人改用土葬的时间要早于九世纪。2001年,在西安市东郊洪庆原发现一座唐墓。根据墓志得知墓主人为契丹王李过折^{〔5〕}。李过折于开元二十三(735年)为契丹叛军所杀,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年)迁葬于西安灞陵原。这座墓的发现表明八世纪中期契丹贵族已经模仿汉人营造墓室来安葬死者。

1993年,北京房山县医院清理了一座唐代“李府君”夫妻合葬砖室墓。有学者认为李府君是唐开元年间奚族首领李诗^{〔6〕}。李府君实为唐开元年间另一位奚首领李归国^{〔7〕}。2005年,在西安昆明路立交桥南侧发现了唐故奚质子热_纥墓。据墓志,热_纥卒于开元十八年(730年),同年葬于西安昆明原^{〔8〕}。这两座墓证明唐开元年间上层奚人已经采用了砖室墓的埋葬方式。契丹与奚异种同类,具有相同的风俗习惯,社会发展也大致同步。因此,在奚人贵族采用砖室墓埋葬死者的同时,契丹贵族也已采用了砖室墓的埋葬方式。这与李过折墓的发现不谋而合。

上述几座契丹与奚的墓葬都是贵族墓,且葬于汉地,可能是受到汉人墓葬制度影响而出

〔1〕《魏书·失韦传》、《周书·库莫奚传》。

〔2〕目前认定的室韦墓葬主要有西乌珠尔墓群、谢尔塔拉墓地、岗嘎墓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发现的布尔霍图伊文化的墓葬(阿谢耶夫、基里洛夫、科维切夫:《中世纪时代外贝加尔的游牧民族》,王德厚、高秀云译,《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俄罗斯专号》,北方文物杂志社编辑出版,1996年)等。

〔3〕契丹早期墓葬中的乌斯吐墓、柳条沟 M1、泥马窝堡墓、后旧门墓、双井沟墓与虎吐路墓等都是火葬墓。辽代萧孝忠墓发现了火烧人骨,应该是一座火葬墓。依据墓志,此墓可考定为奚人墓(雁羽:《锦西孤山辽萧孝忠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2期)。

〔4〕《册府元龟·外臣部·土风第三》。

〔5〕葛承雍:《对西安市东郊唐墓出土契丹王墓志的解读》,《考古》2003年第9期。

〔6〕王策:《〈唐归义王李府君夫人清河张氏墓志〉考》,《北京文物与考古》第6辑,民族出版社,2004年。周峰支持王策的这一观点(见氏著《奚族碑刻概说》,《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社版)》2009年第9期)。

〔7〕毕德广:《唐清河张氏墓志考》,《北方文物》2012年第3期。

〔8〕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市唐故奚质子热_纥墓》,《考古》2014年第10期。

现的特殊例子。但室韦墓葬的发现,为探索契丹早期一般墓葬的出现提供了线索。《北史·室韦传》:“室韦国,……国土下湿,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父母死,男女众哭三年,尸则置于林树之上。”早期室韦人与契丹一样,也流行树葬,后来才改为土葬。中国境内已发现的年代较早的室韦墓葬为西乌珠尔墓群,大致相当于唐中期^{〔1〕}。从西乌珠尔墓群比较统一的墓葬形式、葬具、葬式、随葬品组合及其摆放位置等方面来看,这一时期室韦人的墓葬制度已经成型。换言之,室韦人改用土葬应在唐中期以前,最迟不晚于唐中期。西乌珠尔墓群包含了很多契丹文化因素,如墓中所出 B 型 I 式大口罐、C 型 I 式大口罐、A 型 I 式束颈壶、B 型 I 式长颈壶、A 型 I 式大口壶等器物的形态与纹饰带有明显的契丹文化特征,其他遗物如马镫、铜带饰、铜节约等也与辽墓所出同类器相似。甘珠尔花墓群的文化特征与西乌珠尔墓群接近,应亦为室韦遗存。甘珠尔花 M1 为石棺墓,其形制与塔布敖包 M2、荷叶哈达石棺墓相同,墓中所出 A 型 I 式长颈罐的形制与荷叶哈达墓所出者相近。有理由相信,唐代室韦墓葬受到契丹早期墓葬的影响。室韦墓葬出现的时间不晚于唐中期,则契丹早期墓葬出现的时间亦早于唐中期。

由上文相关考证可知,契丹土葬习俗兴起于唐中期以前,而树葬习俗被遗弃的时间大致就是土葬逐渐兴起之时。《隋书》、《北史》关于契丹树葬习俗的记载,表明这种葬俗是唐以前流行的。《旧唐书》、《新唐书》等史籍的契丹传也记载了契丹的树葬习俗,传文以编年形式叙事,其中关于树葬的记载均置于唐代以前,也可表明契丹树葬习俗流行于唐代以前。

契丹族开始使用土葬的问题,似乎与契丹早期如何处理火化树葬尸骨得到的骨灰有关。契丹人可能最初不是将骨灰埋在地下,在受到突厥人“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习俗影响后,才开始埋葬骨灰。这一转变是在契丹受到突厥汗国统治之后出现的,时间大致在隋至唐初。契丹人开始埋葬先人的骨灰,出现了土坑竖穴墓和砖室或石室墓,同时传统的树葬习俗被逐渐遗弃。契丹早期墓葬中的火葬墓,应该是契丹人最初埋葬骨灰葬俗的子遗。双井沟墓地、海洲乡 M3 附近所出盛放骨灰的鼓形罐、卷唇罐,均在器表钻若干个孔,或为供灵魂出入之用。这是契丹人最初将尸体悬置山树之上,希望死者灵魂归往黑山的变通和延续。

综上可知,契丹早期葬俗经历了由树葬向土葬的转变。在其葬俗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至少受到四个方面的影响:一,契丹树葬习俗当与崇拜山岳思想有关,这一信仰源自乌桓及鲜卑的崇山思想。二,契丹人将死者树葬三年后,收拾遗骸火化,与其直系祖先宇文部的火葬习俗有直接关系,也可能受到乌桓及鲜卑焚烧死者衣物的葬仪的影响。三,埋葬火化遗骸形成的骨灰,可能受到突厥人“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习俗的影响。四,由骨灰葬转变成尸骨葬,则应受到汉族人葬俗的影响。辽建国后,契丹人几乎完全遗弃了火葬,采用尸骨葬的埋葬方式。

附记:本项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东北地区两蕃的考古发现与研究”(15CKG012)的资助。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乔梁研究员的热忱指导,在此谨致谢意!

〔1〕 魏坚:《蒙古早期遗存的考古学观察》,《北方民族考古》第 1 辑,科学出版社,2014 年。

STUDIES ON THE EARLY KHITAN BURIALS

by

Bi Deguang Wei Jian

Khitan is an important nomadic ethnic group in ancient China; it created splendid ethnic culture and made profound influences to the vast northern China during the medieval period and becomes an important front of the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ies and archaeology of the ancient ethnic groups in northern China since the 1900s.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got on the research field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 of the Khitan ethnic group. However, the focus of the researches was on the remains of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of the Khitan ethnic group of the Liao Dynasty but that on the remains including the burials of the Khitan ethnic group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Liao Dynasty was relatively weak. To date, the main discoveries of the remains of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of the Khitan ethnic group before the Liao Dynasty are burials and the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them. In this paper, the Khitan burials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Liao Dynasty are called "the early Khitan burials." The early Khitan burial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southeastern Inner Mongolia and western Liaoning, while from the burials of the Tang Dynasty found in Hulun Buir, Inner Mongolia and Daqing, Heilongjiang, the pottery wares with Khitan style were also unearthed. The early Khitan burials included vertical earthen shaft pit tombs, stone cist tombs, brick-chamber tombs, stone-chamber tombs, etc., the burial positions included inhumation and cremation burials and the grave goods were pottery and porcelain wares, iron and bronze wares, stone and bone implements, etc., and the pottery wares were the main category, the decors of which were mainly comb-impressed dots and the main assemblage was jar and pot. This paper made typological analysis to the pottery wares unearthed from these early Khitan burials, based on which these burials are divided into the early and late phases; moreover,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basic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urials of each phase and explored the type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s and evolutions of the early Khitan burials with the references of the records in the relevant historic literature.

责任编辑：黄益飞